

日本德川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赵曼婷

(江苏省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1549年以葡萄牙国王为后盾的天主教耶稣会来日本传教,揭开了日本有史以来与西方文化接触、碰撞的序幕。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对天主教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们既渴望与葡萄牙人通商带来的贸易利益,又对天主教在日本的迅速传播抱有很深的疑虑。1637年爆发的岛原天主教起义,深深刺激了幕府,使幕府终于采取了根绝天主教的非常措施,实行了锁国。

【关键词】日本德川幕府 禁教 锁国

一、天主教初传日本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人走向海外,开始殖民征服。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

1493年5月4日,两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主持下,划定了海外扩张界线,即有名的教皇子午线。规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约等于3英里)的子午线为分界线,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西班牙,该线以东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葡萄牙。教皇子午线的划定,不仅把从欧洲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划分给了葡萄牙,更使葡萄牙成为了最先与日本接触的西欧国家。

在葡萄牙船驶入日本港6年之后,1549年8月15日这一天耶稣会会士西班牙人方济格·沙勿略一行四人在日本南部鹿儿岛登陆。不久,从领主津贯久那里获得了在鹿儿岛传教的特许状,此后开始在日本传播天主教。

最初的传教是十分顺利的,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接受天主教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战国时代的日本群雄割据,大名们希望利用天主教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他们急需战略物资,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国内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只有依靠南蛮贸易维持经济,而接受天主教是实现南蛮贸易的先决条件;普通民众则对佛教的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他们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此外,也与葡萄牙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和努力有很大关系。沙勿略一开始就认为“日本人是迄今为止新发现的诸国中最高级的人种,异教徒中没有发现比日本人更好的人。”因此,采取了适应主义方针,尽量避免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传教士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把天主教作为佛教的一宗传给日本人,传教用语也尽量借用佛教用语,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

二、织丰时代的天主教政策

1568年,织田信长保护足利义昭进入京都,拥立足利义昭为将军,自己掌握了军政实权。次年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高槻城主和田惟政的帮助下谒见了信长,取得了可以在其管辖境内自由活动的朱印许可状。“我准许传教士在这个城市居住。全部免除他们的课税和住民的义务。在我领国之内他们想要居住的任何地方都将不受到任何妨碍。如有不法之徒干扰,将坚决对其进行惩罚。”在织田信长的庇护下耶稣会的影响更加扩大,1581年信徒达到15万人。

1582年6月2日,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部下明智光秀的袭击,被迫剖腹自杀。织田信长的部将羽柴(丰臣)秀吉登上了政治舞台,天主教的命运也随着这个时局的变动开始发生逆转。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继承了信长的政策,但是随着他的统一事业的进展,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587年秀吉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传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担心会危及自己统治。于是,同年6月19日发布了被称为“伴天连追放令”的法令,规定:日本是神国,从切支丹之国传来的邪法甚为不妥;他们让诸国人皈依天主教,破坏神社和佛阁,这是迄今为止闻所未闻之事;伴天连不宜留在日本,今后20天内应回归各自的国家;黑船为商业而来所以另当别论,今后也可长期进行贸易。“伴天连追放令”实际上是宗教和贸易形式上的分离,重在强调今后仍与黑船积极贸易。1596年发生“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标志着丰臣秀吉对西方基督教的政策从驱逐转变为迫害。

三、五次禁令的颁布

1598年,丰臣秀吉在第二次侵朝战争再度失败的失意中死去,不久德川家康夺取霸权。1603年,家康效法源氏及足利氏,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创了德川时代。

在家康统治前期,由于对外国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很顺利。1603年在日本传教士达129人,受洗人数1605年为793人,次年一跃为8千人。据教会方面的报告,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人。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的农民起义,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

1600年3月中旬左右,荷兰向东洋派遣的5艘贸易船中的一艘利夫德号因遇海难,漂流到日本九州东北部丰后的臼杵湾北岸佐志生。以此为契机,日荷关系便快速发展。德川家康重用利夫德号船长英国人三浦按针和荷兰人八重洲,赐予其宅邸和领地,并聘其为外交顾问,向其详细询问欧洲形势和两国的状况。1609、1613年荷兰、英国分别在平户建立商馆,与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日荷贸易的增长,成为家康将传教与贸易相分离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关键因素,于是家康决定禁教。1612年3月,幕府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严禁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1613年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教,驱逐传教士,关闭教堂,禁止日本人私下举行仪式。

1616年4月,家康去世,秀忠继位。同年8月幕府发布了所谓“元和2年禁教令”,要全国上下直到农民,铲除教会,严禁信教,除明船外,信教的外国商船一律仅限在平户、长崎两地经商。幕府这一禁令,使禁教进入新的阶段,对教会的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徒身上。估计从1619年到1635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刑罚极其残忍,结果大部分教徒被迫改宗。但仍有一部分坚持信仰,参加秘密信教组织。由此幕府更加感到天主教的危险,越发加强禁教。1620年,禁止日本人搭乘外国船航海及输出武器;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次年驱逐葡萄牙人出境;1624年禁止西班牙人来日通商。

1632年1月,秀忠去世,家光继任第三代将军。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幕藩体制,家光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政治,对天主教的镇压尤为强烈。1633、1634(宽永10、11)年,发布第一、第二两次锁国令,实行“奉书船”制度。1635年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的一切日船驶往海外,禁止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1636年发布第四次锁国令,又补充规定,西、葡人在长崎所生子女不许留在日本,违者处死。1637年,爆发了岛原之乱,使幕府看到了天主教在日本国内影响的强大和深远,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威胁,这促使幕府驱逐葡萄牙人的态度更为坚定。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本国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至此,锁国体制最终确立。

参考文献:

- [1]和辻哲郎. 锁国——日本的悲剧. 东京:岩波书店,1997. 311.
- [2]岩生成一. 日本的歴14・鎖国. 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53.
- [3]清水書院編集部編. 新版日本史資料. 東京:清水書院,1978. 126.
- [4]北島正元. 日本の歴史16・江戸幕府. 小学館,1977. 276.

日本德川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作者: [赵曼婷](#)
作者单位: [江苏省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刊名: [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英文刊名: [CHINA AFTER SCHOOL EDUCATION](#)
年, 卷(期): 2009, ""(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4条)

1. [和辻哲郎](#) [锁国—日本的悲剧](#) 1997
2. [岩生成一](#) [日本の歴14・鎖国](#) 1974
3. [清水書院編集部](#) [新版日本史资料](#) 1978
4. [北島正元](#) [日本の歴史16・江戸幕府](#) 1977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盛雪雁](#) [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研究](#) 2006

明嘉靖年间, 中日勘合贸易结束, 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结束。直到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约》, 中国与日本才重新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本文拟对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 并探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成因。

明末清初是中日关系的转型期, 这之前, 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 这之后至1972年9月中日复交, 期间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侵华, 中日关系的主流是敌对。而在十七、十八世纪期间中日两国没有建立起官方外交关系, 两国之间关系有过紧张时期, 但最终走上了平稳。以史为鉴, 研究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双方对外政策, 探讨中日官方关系的演变, 分析日本长期处于明清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边缘的原因, 对于深入探究近代中日关系的渊源, 促进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同时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可填补学术界的研究空白。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引言”简要回顾学术界对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 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简要论述十七世纪前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 明确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

第一章论述明末中日关系。第一节论述明政府在经济上对日本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 军事上以日本为对象建立了以东北防御为重点的沿海防御体系, 以及明政府对日本漂流民的处理政策, 揭示明政府对日本外交政策。第二节论述德川家康时期日本回归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努力。为了改变由于壬辰战争造成的日本外交孤立局面, 德川家康着力恢复对明通交, 重开勘合贸易, 企图作为完全成员回归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明日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没有重新建立起来, 日本游离于朝贡体系的边缘。

第二章论述清前期中日关系的演变。第一节论述清收复台湾前的中日关系,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紧张期。满清入关前后曾主动采取行动向日示好, 但是日本出于华夷观的偏见以及对满清势力的疑惧, 没有给与积极的响应。另一方面日本对于明清交替极为关注, 在明亡清兴后继续与南明政权保持着联系, 支持南明的反清活动, 向其提供军事物资, 甚至直接出兵应援南明。三藩叛乱时期, 日本一如既往地三藩和台湾提供支援。第二节论述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到雍正时期的中日关系,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曲折发展时期。清政府曾经主动提出与日本建立以贸易为中心的官方往来, 日本拒绝。雍正时期中日关系又一度紧张, 但曲折中也有所发展。第三节论述乾隆时期的中日关系,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进入平稳发展期。中日关系是基于日本方面应付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 中国方面应付日本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展开的。漂流民的送还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论述漂流民送还问题, 揭示中日关系的演变。

第三章从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思想文化因素等方面探讨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关系的成因。从历史方面来说, 由于倭寇及壬辰战争的影响, 中国方面对日本心存疑忌, 这在十七世纪初期的明政府方面表现极为突出。受元代蒙古军侵日的影响, 同样是由“夷狄”建立的清政权的出现使得日本对清政权产生疑惧。政治方面, 明末清初中国的国内事务是统治者最迫切解决的问题, 耗费了对外交往的精力。日本德川幕府时期, 幕府将军权力达到顶峰, 为了强本抑末及禁教, 实行锁国政策。经济方面, 由于长崎贸易、东南亚贸易以及外国的中介贸易使得中日政府在朝贡关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所需物品。思想文化因素, 中国方面受“华夷思想”的影响, 对外交往只能采取朝贡的体制, 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加入朝贡体系采取的是“不治主义”的政策。江户时代是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神国思想的发展膨胀了日本自尊自大的意识, 兰学尤其是地球学说的传播对华夷思想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结语”部分包括三个方面, 一论述日本在十七、十八世纪并没有完全独立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外; 二阐明大君外交体制是江户幕府的外交体制, “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构想并不等于这一秩序的实际存在, 但这一构想成为日后日本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 三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 战则两伤, 为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xwjy20090204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e8e4ac98-7f35-433c-b1a2-9e4d0083825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